

# 精英文化的自我拯救

● 許紀霖

讀了陳平原〈近百年中國精英文化的失落〉一文，內心感慨良多。大陸精英文化的滑坡，這早已是不爭之事實，也是當今文化人痛心疾首之所在。昔日的精英們聚首一處，談及時下，頗有文化沉淪之痛感。不過，痛感歸痛感，理智歸理智，時代既然取消了文化精英的傳統角色，那麼與其暗自嗟嘆或牢騷滿腹，還不如調整自己的心態，在一個商業霸權的社會裏，重新進行自我定位。

## 主流文化的顛覆

從寬泛的意義上說，任何一個時代都有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的區分，它們分別形成了歷史上的大小文化傳統。不過從前無論在那個朝代，真正登大雅之堂的、作為主流文化存在的，大約還是精英文化。正因為精英文化的主流地位之不可動搖，所以才常有化雅為俗、教化大眾的自信和豪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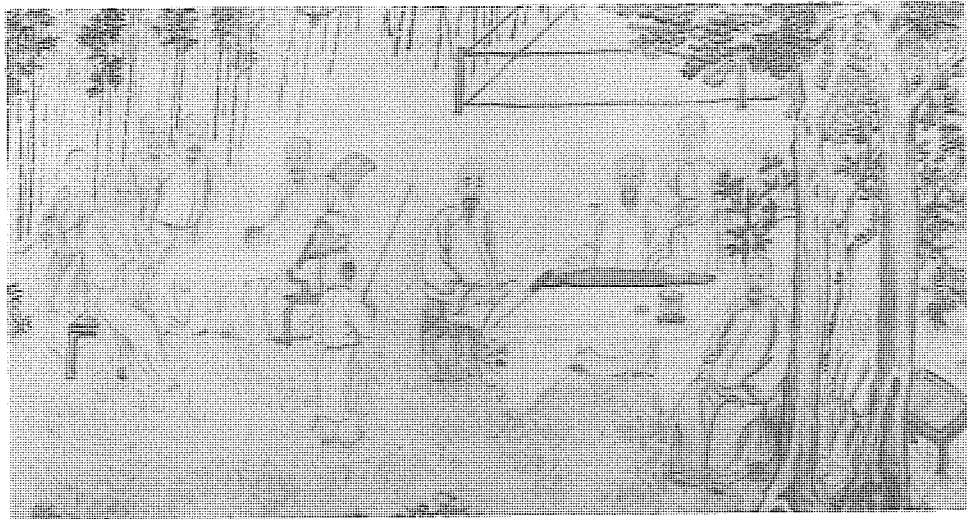
到了90年代，一切都被顛倒過來了。從來充當末等角色的通俗文化一舉擊敗精英文化，成為不可一世的文

化主潮。對於箇中緣由，平原從多個角度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我深有同感。但我想補充的是，崛起於90年代的通俗文化已全然不同於以前的那種市井文化或鄉俗文化，而是一種與現代都市生活直接相關的大眾文化(mass culture)。

台灣學者杭之對大眾文化有一個很精闢的功能性描述，他說：大眾文化指「一種都市工業社會或大眾消費社會的特殊產物，是大眾消費社會中透過印刷媒介和電子媒介等大眾傳播媒介所承載、傳遞的文化產品，這是一種合成的、加工的文化產品，其明顯的特徵是它主要是為大眾消費而製造出來的，因而它有着標準化和擬個性化的特色。」<sup>①</sup>這就是說，大眾文化之所以在當代大行其道，其主要憑藉於在現代化變遷過程中，一個以都市為中心的消費社會的出現、大眾傳媒的發達和商業霸權的建立。在這樣一個充滿商業精神的社會裏，文化變得相當民主化，它不再是精英們教化大眾或自我表現的工具，而只是文化大眾消遣娛樂的精神商品。

在充滿商業精神的社會裏，文化變得相當民主化，它不再是精英們教化大眾或自我表現的工具，而只是文化大眾消遣娛樂的精神商品。

姑且不論這種變化合理與否，有一個事實我們不得不承認：文化主流



近年知識分子紛紛  
「下海」往「錢」看，精  
英文化焉能不衰頹！

的易位既不取決於官方的主觀提倡，也並非由於文化精英們過於熱衷「化大眾」而最後被大眾所化：實實在在是因為商業社會的邏輯隨着現代化的變遷已經滲透到文化精神領域，現代都市生活造就了一個人數絕對佔優的文化消費群落。這種現象不獨為中國所特有，它幾乎是與現代化進程相伴隨的全球性普遍症狀。

縱覽主流文化的變遷史，其功能大約經歷了由「載道」到「言志」再到「消費」的變化，它們分別對應於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三個時期。以西方為例，在前工業社會的中世紀，文化只是基督教的奴僕，充滿了神學的意識形態色彩。進入近代社會之後，文化的功能從「載道」轉向「言志」，蛻去了神學說教的外衣，變為自我表現、張揚個性的個人主義藝術。其間雖有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形式區別，但都不失為注重個體話語的精英文化。6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進入了一個社會學家所稱的後工業社會，資本主義的功利效率原則在文化領域戰勝了個人主義原則，文化像其他商品一樣具有消費和市場的屬性，無所不在的大眾傳媒恰似阿多爾諾、霍克海默所說的「文化工業」，將

適合大眾口味的文化產品標準化、批量化地製作出來，文化被徹底商業化、娛樂化了。目前西方社會的主流文化大抵如此。

回顧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主流，歷史上曾長期滯留在「載道」的窠臼。先是儒家的「文以載道」，隨後是各種各樣的「文化救國」，最後是為工農兵服務的「無產階級文化」。80年代以後大陸的文化主流發生了令人矚目的變化。短短十幾年間，走過了西方幾個世紀經歷的道路。在80年代初，無論是學術還是文藝仍然充滿了意識形態氣氛，諸如思想解放運動、干預文學、傷痕文學等等莫不如此。到80年代後半葉，一種個人主義的自我表現藝術開始狂飆突起，實驗主義戲劇、行為主義藝術、搖滾樂、新語體小說、現代主義繪畫等純藝術風格在精英圈中逐漸佔主流，大有取代「載道」傳統之勢；而在學術界「為學術而學術」也重新被人提起。然而好景不長，到90年代初，大眾文化挾着市場經濟的拍天大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蔓延神州，不管是老牌的「載道」文化還是新銳的個人主義藝術統統敗在它的手下了。

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接受，只要現

代化進程不發生逆轉，在相當一個時期裏通俗文化的主流地位恐怕是難以動搖的，精英文化的邊緣化多少是一個難以下咽、又不得不吞下的現實苦果。

既然歷史不可抗拒，就大可不必一味沉浸在過去的回憶之中。黃金時代已一去不復返，精英文化與其徒勞地重返夢中的伊甸園，還不如立足現實，在大眾文化時代積極爭取自己的合理存在。

## 邊緣存在的合理性

在一個現代都市社會中，大眾文化固然是無可爭辯的主流文化，但這並不意味着精英文化就此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現代社會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社會結構的分殊性決定了其文化的開放性質。從文化消費的意義上說，都市裏不僅有熱衷於流行音樂、暢銷小說、影視明星的大眾群落，也同時存在着對經典藝術、人文精神、學術著述一往情深的邊緣群體。即使從純粹的供求關係而言，精英文化也有其充分的市場價值。何況，具有幾千年悠久傳統的精英文化蘊含着人類社會發展至今的文明成果和民族遺產，它們對人類文明的未來發展有着無可替代的借鑒價值，任何一個民族只要不是發瘋，都不會將它們毀於一旦。

因此，在西方社會（尤其是歐洲），一方面大眾文化洶湧澎湃，另一方面精英文化仍然以非主流的形式繼續存在，而且這一市場的弱者還受到政府和社會的重點扶植。然而在中國大陸，無論是政府、媒體，還是商界、民眾，似乎從來沒有多元的概

念，一旦精英文化在市場失寵，就立即視之為棄履。如今精英文化不要說重返主流，連一席可憐的邊緣地位也岌岌可危！社會上上下下普遍功利化、實用化、物慾化，人文精神喪失無遺。

問題的嚴重性還不止如此。作為一種主流文化，大眾文化在其合理存在的背後，隱藏着種種不合理的實質。近幾十年來，西方的法蘭克福學派對這種工商社會的意識形態已經作了系統的批判。然而，在大眾文化方興未艾的大陸，對其弊端卻普遍匱乏最起碼的認知。在可疑的商業動機促使下，媒體和評論界對炙手可熱的流行作品、娛樂圈明星到處是阿諛叫好聲。由於大眾文化缺乏嚴肅的批評監督，各種濫竽充數、良莠不分的怪狀已經到了泛濫成災的地步。本來超越商業利益的精英文化理應承當起批評的職責，在大眾文化時代，思想界、評論界更有理由顯現自己的存在價值。在現代社會中，一種文化要保持健康的發展，就像政治一樣，必須有自己的「反對黨」，消滅了對手，也就最終消滅了自己。在這個意義上說，非主流文化作為一種制衡力量的存在和繁榮，對主流文化亦是一幸事。然而在習慣以「你死我活」邏輯立身處世的大陸社會，在熱情地擁抱新生事物「商業文化」的同時，卻勢利地將嚴肅文化冷落在一旁。

我們不禁要追問，一個文化傳統比歐洲更為古老的文明古國為甚麼會幾乎一夜之間喪失了人文精神？陳平原文中所分析的諸如文化精英社會角色和經濟地位的衰敗，民眾群體中反智主義的集體無意識和知識精英文化選擇的失誤等等，固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我以為，更深沉的潛因也許正

具有幾千年悠久傳統的精英文化蘊含着人類社會發展至今的文明成果和民族遺產，它們對人類文明的未來發展有着無可替代的借鑒價值，任何一個民族只要不是發瘋，都不會將它們毀於一旦。

在中國大陸，無論是政府、媒體，還是商界、民眾，似乎從來沒有多元的概念，一旦精英文化在市場失寵，就立即視之為棄履。如今精英文化不要說重返主流，連一席可憐的邊緣地位也岌岌可危！

存在於我們這個民族傳統本身。以前尊重精英文化與今天拜倒在商業文化的石榴裙下遵循的是同一個邏輯——實用原則。

在古代儒家文化之所以被奉為圭臬，乃是因為社會上下普遍認為它是有用的：權貴們看中的是它有助於大一統政治秩序，百姓們相信它能維護宗法倫理關係，士子們背誦它為了登科入仕，經師們研究它乃認定其為修齊治平所必備的萬古長青之真理。近代以後，儒家文化衰敗，但各種新潮的精英文化因為具有所謂救國救世救心的效用而仍然大行其道，而且還負有「化大眾」的神聖使命。在當時，娛樂性的通俗文化雖然在社會底層流行，但總有玩物喪志的嫌疑，頗為官方和正統的文化界所不齒。不妨這樣說，過去精英文化在中國之所以幾千年而不衰，多少是與當時某種意識形態或社會期望有關，社會上下之所以願意養士，尊重人文精神，無非是相信他（它）們有用而已。

一旦大陸進入了市場經濟時代，情形就大變了！鄧小平的「貓論」經過數十年的爭論，終於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人們不再以某種意識形態，而是以一種與市場接軌的實用觀點來重新評判一切。傳統的實用精神未變，變化的只是衡量的尺度：從政治走向市場。於是文化被分為三個市場價值不同的等級：第一等級是科技文化，因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能夠產生直接的物質效用，因此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青睞。在知識分子群體中科學家尤其是技術專家的地位的確今非昔比。第二等級是消費文化，由於其無傷大雅，具有樂樂呵呵、粉飾太平的功能，又能滿足大眾平庸的精神需求，自然受到官方和市場的雙倍寵愛。至

於「不會抓老鼠的」精英文化，既缺乏廣泛的市場需求，又含有官方和市場所忌諱的文化批判意識，遂成為二者所共同排斥的灰姑娘。精英文化過去沾了「經世致用」的意識形態之光而大行其道，如今意識形態倒了厄運，精英文化也失去了獨立的存在價值。從這個意義而言，精英文化而今的衰敗不僅與整個民族的實用性格有關，而且也是中國知識精英長期以來缺乏學術獨立精神的歷史報應，以至於精英文化到了今天不說主流寶座江山易主，連邊緣地位也朝夕難保！

一個千年文明古國一旦以實用的尺度來衡量自己的人文精神，雖然它可以一度人文治國，但在現代化的變遷中會比其他國家更加勢利地否定自己的人文傳統，比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更加功利化、物慾化，最後整個文明毀滅在一片糜爛的縱慾之中。古羅馬帝國的一幕是否會在二十一世紀中國重演，並非是個杞人憂天式的問題。

## 學者與思想家

如何挽狂瀾於既倒、拯救沒落中的精英文化，這是個過於龐大的問題，並非文人書生所能解決，而且從短期來看也少有解決的希望。對於文化精英來說，大概唯一能夠做的是調整自己的心態，在大眾文化時代重新尋找安身立命之地。

如今的大陸文化人深感世道艱難，身陷難以解脫的生存危機。據我的觀察，文化人的痛苦固然有相對貧困的物質成分，但更主要的還是個人尊嚴和精神價值的失落。尤其是一些知識精英，80年代一度是他們最為風光的年代。當時借助意識形態的發燒

精英文化而今的衰敗不僅與整個民族的實用性格有關，而且也是中國知識精英長期以來缺乏學術獨立精神的歷史報應，以至於精英文化到了今天不說主流寶座江山易主，連邊緣地位也朝夕難保！

大談文化，一本書或一篇文章就可以呼風喚雨，名揚天下。而今回首往事，恍若隔世，昔日的鏡頭被一群包裝得十分精緻、卻毫無思想智慧的娛樂圈明星搶去。眼見世風日益平庸，自己的才智又無用武之地，和者寥寥，自然感到分外的寂寞悲涼。比較起以前的政治壓迫，這是一種更深沉的智慧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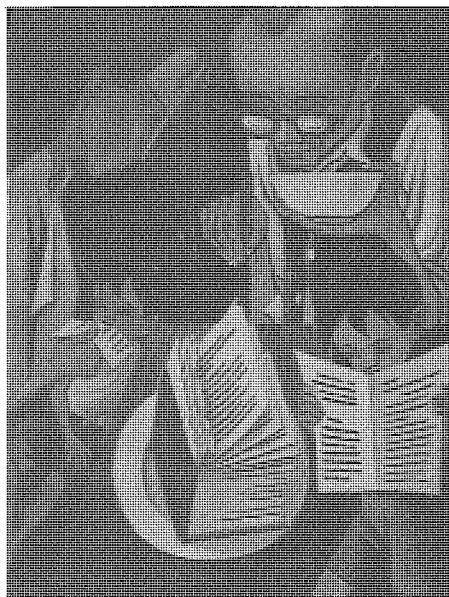
既然痛苦總是難免的，唯一的解脫之道大約就是認定自己的現實位置。作為一個人文知識分子，他在現代生活中可以扮演兩種角色：學者和思想家。雖然這二者可一身兼二任焉，但各自的使命和功能是不同的。作為學者，他的使命是為學術而學術，在知識世界求知，不一定也沒必要對現實世界承擔具體的責任。社會也容許他躲在象牙塔裏保持「隔離的智慧」。而作為思想家，其對人類的命運和民族的前途就負有不可推卸的道義責任。他必須走出象牙塔，參與現實生活的文化過程，對社會變化作出同步反應，始終保持深切的文化關懷和現實批判精神。可以說，作為一種理想類型的人文知識分子，應該同時具備學者的「超越」和思想家的「介入」兩種秉性。但落實到每個個體，社會容許他側重於某個方面或僅扮演一個角色。

在80年代，大陸知識分子對上述兩種角色的界限在認識上是相當模糊的。在「文化熱」這場迷漫着濃郁意識形態色彩的學術討論之中，常常有這樣的情景：一些人自以為在進行公正的學術探討，卻充滿了人間關懷，字裏行間透出隱隱的政見；與此相應，當他想對現實進行文化批評時，又不敢直面人生，而是懦怯地躲在晦澀的學術話語背後。但在80年代離奇的時

代氛圍下，這種角色的顛倒和混淆卻獲得了異乎尋常的社會轟動效應，學術著作借政治隱喻而洛陽紙貴，學者在大眾眼裏成為社會正義的化身。

當一場政治激情過去之後，如今一切都各歸其位了。意識形態在大眾生活中的淡出使得學術也復歸沉寂，回到原先狹小的精英圈中。但一些學者仍然懷戀過去萬眾矚目的非常時代，反而視今日為不正常。實際上，學術本來就是少數文化精英的事業，按其本性不應也不可能引起強烈的社會轟動效應。如果一個知識分子在今日之世仍然決心以學術為相伴終身的職業，就必須安於目下邊緣的狀態。學者雖說不一定與貧困相伴，但必然與寂寞為伍。自古以來真正的大學者如王國維、陳寅恪、湯用彤、趙元任等固然在學術圈裏聲名顯赫，但並不為一般的社會大眾所聞知，他們的著作也從未打進甚麼暢銷書的排行榜。流行的未必流傳，流傳的也未必流行。學者的真正貢獻在於拿出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傳世之作，而不是轟動一時卻又很快煙消雲散的時文。比起追求知識的不朽，區區現世身名也就算

如今的大陸文化人深感世道艱難，身陷難以解脫的生存危機。文化人的痛苦固然有相對貧困的物質成分，但更主要的還是個人尊嚴和精神價值的失落。尤其對知識精英來說，這是一種更深沉的智慧痛苦。



不了甚麼。這大概就是學者人格的意境。

倘若一個人文知識分子不甘心做一個純學者，還想對現實生活發生影響、積極參與當下的文化過程和道德重建的話，那麼就必須走出學術的象牙塔，充分認識大眾文化時代的種種特點，以發揮思想者的現實功能。大眾文化時代較之以前，最大的變化就是文化傳播媒介的改變。傳統的傳播手段如書本、戲劇、電影、講演等等早已不合時宜，代之而起的是輻射範圍極廣、具有最大傳播效應的大眾傳媒工具報紙、電台、電視、pop音樂會等等。如今成為大眾偶像的歌星、影星們正是借助這些大眾媒體而得以走紅的。具有社會責任感的思想家要使自己的價值、理念廣泛影響於大眾，就必須深入地介入媒體，改變自己的話語表達方式。美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本來只在學術圈裏有影響，但自從他通過電視講座傳播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之後，立即贏得了全美國的聲譽，後來為里根政府所採納，成為80年代美國經濟政策的學理基礎。同樣，1988年《河殤》之所以在大陸風靡一時，就成功地借助了電視的威懾力。

在大眾文化時代，一切文化都成為消遣的對象、娛樂的工具，文化背後所蘊含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都是在近乎遊戲的狀態中不知不覺地訴諸於大眾的。大眾們已經習慣於經過精緻包裝的文化產品，否則縱然思想新銳、內蘊再豐富，僅憑那種單調的形式就會使大眾產生心理上的拒斥感。因此思想家們也必須學會包裝，實現話語形式的轉換，通過大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傳播自己的思想學說。

概而言之，精英文化要想在當代

大眾社會求得生存和發展，首先要有自己的獨立品格，那種為學術而學術、為藝術而學術的精神，真正的學者要有耐得住寂寞、坐一輩子冷板凳的平常之心。社會也要有容忍這些「無用之學」的肚量和舉措。其次，精英文化要繼續扮演教化社會的角色，就必須進入大眾媒體，首先大眾化，隨後「化大眾」。以上二者是學者和思想家分別承擔的角色，不過，一個既充滿學術興趣又不失人間關懷的知識分子在認同角色時，常會有吳宓所說的「二馬裂屍」之感。吳宓當初謂學術之馬與教化之馬「常互背馳而相衝突」，「二馬分道而奔，則必將受車裂之刑矣」<sup>②</sup>。這大概是一個人文知識者的永恆痛苦。即使如此，我們也不能合二馬為一馬，重蹈80年代角色錯位的悲劇。騎甚麼馬，就走甚麼道，牢守學者和思想家各自的界限，並有足夠的勇氣承擔各自的不同的社會使命與心靈代價。

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對於人文知識分子來說，過去的榮耀永遠消逝，新的位置有待於自己爭取。天助自助者，精英文化的衰落要靠文化精英的努力來自我拯救。

#### 註釋

① 杭之：《一葦集》（北京：三聯書店，1991），頁141。

②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頁47。

許紀霖 1957年生於上海。獲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碩士學位，現為上海華東化工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精英文化要想在當代大眾社會求得生存和發展，首先要有自己的獨立品格，真正的學者要有耐得住寂寞、坐一輩子冷板凳的平常之心。其次，精英文化要繼續扮演教化社會的角色，就必須進入大眾媒體，首先大眾化，隨後「化大眾」。